

道义还是利益： 中东变局以来德国埃及政策的 调整及其原因^{*}

钱 磊

摘要：德国与埃及的关系始自普鲁士埃及学家对古埃及文明的热情和憧憬。自1864年普鲁士与埃及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经历了文化联系、经贸交往、政治互动三个阶段。二战之后，德国虽然一直是埃及第二大经贸伙伴，但其在埃及外交总体战略中的地位总是被边缘化，而这一情形在中东变局之后发生转变。2011年埃及革命后，默克尔政府曾与欧盟对埃政策保持一致达四年之久，却在2015年初果断抛开人权和民主标准重启德埃关系，德埃政治互动迅速加强，德国成为埃及最具潜力的经济和政治伙伴。日益密切的德埃关系为默克尔获取欧盟地中海政策领导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可能削弱埃及“向东看”的动力。

关键词：德埃关系； 德国埃及政策； 中东变局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博士研究生 天津 300350

中图分类号：K5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1-0018-15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非变局对环地中海国际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2JJD81001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德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

自 1864 年夏普鲁士王国与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建立领事级外交联系以来，德埃关系就在曲折中蹒跚前进。二战之后，德国虽然一直是埃及第二大对外经贸国，且被视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外部伙伴，但德国在埃及外交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一直被边缘化，脆弱的双边政治互信及政治协同与其繁荣的双边经贸联系极不匹配。这种情况在 2010 年末开始的中东变局中发生了改变。

2011 年“1·25 革命”后，德国在埃及动作频频，但总体上仍摆脱不了追随欧洲的模式，而此时欧盟地中海政策核心战略的制定者仍是英法两国。但到 2015 年初，形势发生转折。3 月，德国公司与埃及政府签署总额 80 亿欧元的电力合作项目，同时默克尔政府正式接受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Abdel Fattah El-Sisi) 于 6 月访德。这一转变震惊了欧洲舆论，诸如默克尔为西门子公司的利益而“抛弃埃及人民”这样的批评之声纷至沓来。但这些声音并未阻止德国推进德埃关系正常化的脚步。到 2017 年 3 月默克尔访埃之时，德国在埃及外交战略总体结构中的地位悄然改变，德埃伙伴关系达到一个新高度。而鉴于埃及在周边地区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改变很可能极大地增强德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进而影响到美、俄、欧在中东地区博弈的总格局。基于此，本文拟在简要回顾德埃关系百年史的基础上，重点观察和分析中东变局以来德国埃及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并探讨这种调整背后的原因。

一、与欧洲保持一致：中东变局之初的德国埃及政策

德国与埃及的关系始自普鲁士埃及学家对古埃及文明的热情和憧憬。^① 19 世纪 30 年代，继法国古埃及学兴起之后，普鲁士也出现了一大批古埃及学者，如理查德·雷普修斯 (Richard Lepsius, 1810 ~ 1884)、海因里希·布鲁格施 (Heinrich Brugch, 1827 ~ 1894) 等。^② 1864 年秋天，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支持下，布鲁格施建立了普鲁士驻开罗领事馆，正式开启了普鲁士与埃及的外交关系。^③ 1871 年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建立后，普鲁士驻开罗领事馆升级为德意志帝国驻埃及领事馆，1922 年德埃复交后升级为大使馆。

从 1864 年建交到 19 世纪末，文化联系一直是普鲁士及德国与埃交往的主要维度。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主政普鲁士和德国的俾斯麦一直奉行“在埃及不给大英

^① Joseph J. Malone, “Germany and the Suez Crisi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20, Issue 1, Winter 1966, pp. 20 – 30.

^② Thomas W. Kramer, *Deutsch-ägyptische Beziehungen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Tübingen und Basel: Hosrst Erdmann Verlag, 1974, S. 205.

^③ 同上, S. 169.

帝国制造麻烦”的理念,故而普鲁士及德国驻埃领事馆的外交作用一直没得到发挥。^①19世纪90年代初威廉二世主政后这一策略发生了改变,开始在东方扩大德意志帝国的影响力。1892年,德国与埃及签署《德埃贸易协定》,从而开启了德埃经贸互动的黄金二十年。

《德埃贸易协定》签订之时,双方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还微乎其微,德国对埃及的商品出口量只占本国出口总量的0.7%,埃及对德国的商品出口量更低,只占埃及出口总量的0.2%,埃及的债券也从未登陆过柏林债券交易所。^②然而,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德国已成为埃及第二大经济伙伴,其中对埃及出口总量仅次于英法两国,从埃及进口则仅次于英国,过往苏伊士运河的交通量也仅次于英国。^③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德埃繁荣的经贸关系,英国殖民当局控制下的埃及政府两度对德国公民、企业和政府的财产进行清算。到1947年,德国对埃及的出口量只占埃及总进口量的1.9%,德国从埃及进口的商品量只占埃及总出口的0.2%,整体经贸规模不足1938年的十分之一。^④

1952年10月10日,联邦德国与埃及共和国建交。在冷战的大多数年代中,没有殖民包袱的德国一直是埃及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此期间两国的经济互动不断提升。然而,双方的政治及外交关系却因联邦德国的以色列政策和阿登纳总理推行的“哈尔斯坦主义”备受冲击,其导致的两个最严重的后果是,1965年5月联邦德国与以色列建交后,以埃及为首的多数阿拉伯国家宣布与联邦德国断交,以及1969年埃及与民主德国建交。即便如此,上述事件都未对联邦德国与埃及的经贸互动造成明显的影响。^⑤

1972年6月8日埃及与联邦德国恢复外交关系后,德埃政治关系进入稳定期,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1974年萨达特总统推动埃及对外经济开放后,联邦德国与埃及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投资方面,1974年联邦德国对埃及的投资额只有0.3亿马克,1979年则上升到2亿马克,1984年更是超过10亿马克。在贸易方面,1971年双边贸易总额为7.5亿马克,1975年达到11.7亿马克,1980年上升到23.4亿马克,1985年则达到33亿马克。1985年后埃及经济陷入低迷,联邦德国对埃及的投资和经贸均有所下滑,但对埃及的发展援助则稳中有升。1980年西

^① Ottomar von Mohl, *Ägypten*, Leipzig: Paul List, 1922, S. 14.

^② Karl Hron, *Ägypten und die Ägyptische Frage*, Wien: Rengersche Buchhandlung, 1894, S. 83.

^③ Thomas W. Kramer, *Deutsch-ägyptische Beziehungen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S. 189 – 190.

^④ Cérès Wissa-Wassef, “Les relations entre l’Egypte et les deux Etats allemands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1972, Volume 37, Numéro 5, pp. 609 – 638, ici p. 628.

^⑤ 同上, pp. 635 – 638.